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文物与考古研究

第 4 辑

1987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文物与考古研究 (4)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桂馥茹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½印张 192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248-0/K·16

(书号 11201·93) 定价 2.0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铜镜的源流——再论韩国青铜文化的起源	李亨求	一
东亚陶器起源年代管窥（一）——《泉福寺洞穴の發掘 記録》书后	邓 聰	1
谈卫盂、卫鼎铭所反映的西周田制	王人聰	19
甲骨文合集缀合补遗（续二、续三）	蔡哲茂	三九
两片迷途归宗的字甲	石璋如	四六
汉碑考辨三则	叶国良	五四
院藏传包资料述例	冯明珠	六一
奏摺录副中的附图	傅乐治	六九
清代官窑款式概要	刘良佑	七五
明朝早期的掐丝珐琅工艺	张临生	八二

銅鏡的源流

李亨求

——再論韓國青銅文化的起源

編者按：本文曾以韓文於一九八三年發表在「韓國史論」上，作者李亨求先生，是韓國青年考古學者，他的另一篇論文「銅鏡的源流——中國青銅文化與西伯利亞青銅文化的比較研究」刊於本刊一卷四期，與本文為一體的研究。

壹、序 論

要談韓國青銅器文化，宜先從渤海沿岸地區的青銅器文化談起。

所謂的渤海沿岸地區，廣義的是指環繞着渤海的地區，其中包括：南部的山東半島、西部的河南省中北部、河北省一帶、北部的遼西、東北部的遼東半島及東部的吉林省中南部以及朝鮮半島的一部分。而本文所稱的河北省東北部、遼西地方、遼東半島及吉林省中南部等地區，乃是指狹義的渤海沿岸地區。

渤海沿岸地區從史前時代開始，在歷史上、文化上和韓國有很密切的關係。尤其在相當於中國殷末周初（紀元前十一世紀左右）來了被周人所逐的殷遺民，以箕子為首，建立了箕子朝鮮（註一）。到了紀元前三一三年，朝鮮侯也追隨着韓、魏、趙、燕、中山等五國，自尊為王。約在紀元前二七八年，燕將秦開東征，迫使原以遼河流域為西界的箕子朝鮮，遷移至遼東半島和大同江流域。因此，歷史上箕子朝鮮的疆域——渤海沿岸，也可以納入韓國考古學上的青銅器時代。（參考地圖一和二）

目前在韓國的言論，均承認韓半島和古朝鮮地域的渤海沿岸是相同的青銅器文化圈；但却完全否認在地理上、歷史、文化上和中國有密切關係，同時堅持從西伯利亞傳入的「北方系」，才是韓國青銅器文化的全部。在一九八三年韓國國定教科書的「高級中學國史」第五冊第八頁記載如下：

「從我國（韓國）青銅器所含銍的這一點，及在裝飾上愛用斯基泰西伯利亞系統之動物花紋看來，若說受了中國的影

日人江上波夫在一九三六年提出的「綏遠青銅器」的報告書中，提出了一段意義深長的話〔註一〕：

「鑲鈕平板鏡的起源看起來好像是在西南亞細亞，其實在西北利亞 Kurgan 文化前的 Karasuk 文化中就已經可見端倪了。在 Kurgan 文化第一期就盛行，並延續至鐵器時代的初期。在東俄羅斯的 Ananino 文化裏也可看出它的影響。鑲鈕平板鏡雖是素文，但間或有細線式獸形紋，這一點大概是受斯基泰系統動物文的刺激。可以確定的是鑲鈕平板鏡絲毫未受中國銅鏡的影響。」

筆者特別指出江上波夫這段文字的「意義深遠」，是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時代所出版的這本書「綏遠青銅鏡」可能有着某種特殊用意。實際上，日本學界掀起對渤海沿岸地區及內蒙古長城地帶的考古熱潮，是在日俄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也就是在日本軍閥對中國大舉侵略的同時〔註二〕。因此我們研究東北亞出土文物或韓國古代史，應該考慮到這一點。在日本帝國主義浪潮下完成的東北亞研究，強調古朝鮮文化與中國無關，僅與西伯利亞關連。在時間上使我們聯想到日帝的「鮮朝史觀」是否有某種暗示。

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考古學上的成果，漸漸地脫離上述的說法。就一般常識可以判斷，韓國自古以來，和溫暖的中國海陸交通遠比和又冷又遠的西伯利亞來得頻繁。同樣地，在「高級中學國史」及「綏遠青銅器」裏，將韓國青銅器文化源流敘述得如此簡單，也是難以令筆者置信的。因此本文就從介紹古朝鮮青銅文化中的銅鏡着手，藉此來探討韓國青銅器文化的源流。

所謂的銅鏡，在形式上是圓板形的，鏡面光滑可照，鏡背則有半環形鏡鈕，穿上繩索。本文重點在研究鏡背面的變化，而鏡背的變化則在紋飾的變遷和鏡鈕的安排。筆者認為韓國銅鏡研究最大特色是把具有幾何紋和多鈕銅鏡當成幾何紋多鈕銅鏡。在金良善先生的「多鈕幾何學紋鏡研究抄」一文中指出：「自光復後，在韓國、中國、滿州等地出土的各種資料，可以在西伯利亞、綏遠式多鈕銅鏡中找到韓國特有的多鈕幾何學紋鏡的祖型。」〔註四〕

目前韓國的言論也大抵與此相同〔註五〕。「高級中學國史」則是集此種說法之大成，日本學界的看法也始終一致，早期的代表是高橋建目、江上波夫〔註六〕，近年來則是樋口隆康、千葉基次等〔註七〕。不過，筆者始終以為這種說法不免有許多

矛盾。

就銅鏡來說，西伯利亞至今尚未發現幾何紋銅鏡或多鈕銅鏡。唯一出土的一面「鑲鈕平板鏡」是屬於紀元前十至八世紀的「Karasuk」文化，因此就紋飾與時間上來看，如何能說韓國銅鏡起源於西伯利亞呢？相反的，在中國「中原地方」，先有殷代幾何紋單鈕銅鏡，再有春秋初虢國動物紋雙鈕銅鏡。因此，依筆者的淺見，韓國銅鏡的源流應該是：殷↓渤海沿岸↓朝鮮半島。在「銅鏡的源流」一文中，曾討論殷周時代初期的銅鏡與西伯利亞的關係，本文則以渤海沿岸地區的幾何紋多鈕銅鏡【註八】為主題，進一步說明渤海沿岸地區與朝鮮半島青銅器文化的淵源。

貳、古朝鮮時代渤海沿岸地區的銅鏡

在「銅鏡的源流」一文中，筆者對於殷代的幾何紋單鈕銅鏡和西伯利亞的素紋單鈕銅鏡及西周末東周初之動物紋多鈕銅鏡已有介紹，並將殷周時代的銅鏡和西伯利亞「Karasuk」文化的銅鏡作詳盡的比較；同時也將「Karasuk」文化對渤海沿岸地區青銅文化可能的影響做了全面性的檢討。在此筆者透過殷代後期屬於箕子朝鮮的渤海沿岸北部地區的「南山根類型」的素紋單鈕銅鏡；東北部地區的「十二台營子型」的幾何紋多鈕銅鏡；東部地區高句麗以前的幾何紋雙鈕銅鏡的研究，想要再一次地確定中國「中原」地方的殷代幾何紋單鈕銅鏡與包括朝鮮半島的渤海沿岸地區銅鏡的關係，其目的是在查明韓國古代史研究的癥結，並探究箕子朝鮮疆域的青銅器文化源流，以完成筆者長久以來的研究。

(一) 渤海沿岸北部地區的銅鏡

Ⅰ 南山根一〇一號石槨墓出土的素紋單鈕銅鏡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三年從遼寧省寧城縣南山根遺址，挖掘到十餘座的石槨墓，其中，在第一〇一號石槨墓裏發現有兩面的素紋單鈕銅鏡及一些鼎、簋、簋等，和十二件的「中原式」青銅禮器和青銅工具、青銅武器、青銅車馬器及卜骨等【註九】。

銅鏡的形式是圓的，背面中央有一個半環形紐，周緣突起，但是整個鏡背是素面無紋，直徑六點六公分（圖一）。

②標本M一〇一—六〇號的素紋單鈕銅鏡

雖然有嚴重的破損，但仍可看出是圓形的鏡身，鏡背中央掛着一個小的半環形紐，周緣順着邊緣繞着，鏡背也是素面無紋。直徑八點四公分（圖二）。

Ⅱ南山根一〇二號石槨墓出土的素紋單鈕銅鏡

在一九六三年挖掘到的一〇二號石槨墓（M一〇二）裏，有和在一〇一號石槨墓裏所出土的素紋單鈕銅鏡相同的銅鏡一面，是在人骨腰部發現的。此外，在這石槨裏看到的雖然只是些銅斧、青銅刀子、銅串飾、青銅馬具等小型器物，但最特別的是在人骨的右臂骨下發現的「刻紋骨板」（註一〇）（圖三），是令人注意的。這面銅鏡（標本M一〇二—三四）是圓形的，鏡面光平，但是邊緣向背面轉角，形成鏡背的周緣，鏡背是素面無紋的，有一個半環形紐，直徑七點八公分（圖四）。

Ⅲ南山根類型青銅器的特徵和年代推定

所謂的「南山根類型」是和「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類型相同的墓制，這種石槨墓也廣泛地分佈在朝鮮半島，雖然在一〇一號墓中可以看到大型陪葬的青銅禮器，但是一般仍以青銅武器為主，另有青銅工具、青銅馬器及青銅裝飾等。除此之外，在朝鮮半島也經常



圖一 南山根101號石槨墓出土素紋單鈕銅鏡（M10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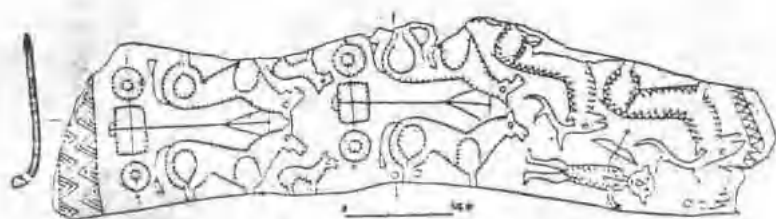
圖二 南山根101號石槨墓出土素紋單鈕銅鏡（M101-60）

可以看到一種叫做「琵琶形」的青銅短劍，這在南山根一〇一號石槨墓中也有發現。（有關墓制及「琵琶形」青銅短劍，稍後再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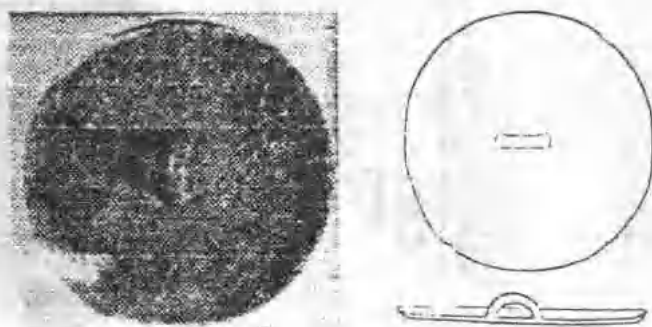
「南山根類型」的素紋單鈕銅鏡，其形式與西周時代素紋單鈕銅鏡是一樣的（參看拙作「銅鏡的源流」），大小也差不多，尤其鏡背中央掛鈕的方法更是相同。而且在南山根一〇一號石槨墓裏挖到的銅鼎、銅簋、銅簠等青銅禮器和銅戈、銅鏃、銅矛及銅斧等青銅武器及青銅工具，據說也和西周末至東周初的「中原式」青銅器的形式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兩者間有着某種的關係。

在青銅禮器或青銅短劍的把柄上所出現的蟠螭紋、竊曲紋、垂鱗紋、弦紋、雙龍紋、夔龍紋、羽狀紋等也和殷周時所流行的紋樣相同。

南山根一〇二號石槨墓中出土的青銅器諸如素紋單鈕銅鏡、銅刀、銅斧、銅鏃、銅砲等是和一〇一號石槨墓中的銅器相同。此外，在一〇二號石槨墓中首次發現的「刻紋骨板」提供我們了解墓槨主人社會地位的重要資料；它是一塊動物的骨板，上面刻有狩獵人物和雙頭馬車的圖案，這雙頭馬車的造形也和殷周時代車馬坑裏



圖三 南山根 102 號石槨墓出土刻紋骨板



圖四 南山根 102 號石槨墓出土素紋單鈕銅鏡

出土的例子相類似（圖三）。由此看來，一〇二號石槨墓的主人應該是有相當地位的武將。

再者，從一〇一號石槨墓中有青銅禮器五百餘件，更可推測一〇一號墓主，也是箕子朝鮮社會中的領導人物。

「南山根類型」的年代測定，是以在一〇一號石槨墓出土的銅鼎、銅簋、銅簠等青銅禮器和銅戈、銅矛等青銅武器為基準，和周代的青銅武器作比較，證實與虢國墓地出土的銅鼎、銅簋、銅簠、銅戈、銅矛【註二】是一致的，以此推斷南山根文化的年代應該在西周末至春秋初，相當於西元前九世紀中葉至西元前八世紀中葉【註二】，再者，根據研究者的報告，也是強調一〇二號石槨墓的年代是在西周末至春秋初期【註三】。

「南山根類型」的素紋單鈕銅鏡的鑄造技術，可以和鄰近的北京市白浮村遺址的殷遺民所製造的素紋單鈕銅鏡分庭抗禮，由此推測兩者間可能有某種程度的文化交流。這些遺物，大概是先前住在大凌河流域殷遺民的後裔和土著東夷系民族相融合的箕子朝鮮社會的產物。

（二）渤海沿岸東北部地區的銅鏡

1. 十二臺營子出土的幾何紋多鈕銅鏡

有關這座古墳，韓國學者已有專文介紹【註四】。一九五八年在遼寧省朝陽縣西南大約十二點五公里的大凌河流域，有個叫做十二臺營子的山村，在該處挖掘到三座石槨墓【註五】。在一〇二石槨墓中發現了兩面幾何紋多鈕銅鏡和兩件「琵琶形」青銅短劍，在三號石槨墓裏則發現了一面幾何紋多鈕銅鏡，這古墳的墓制、幾何紋多鈕銅鏡和「琵琶形」青銅短劍的樣式，因和先前在韓國所發現到的極為類似，相當引人注意。

① 一號石槨墓出土的銅鏡

石槨墓的構造，大體上和廣泛分佈在渤海沿岸及韓半島的青銅器時代的石槨墓一樣，在墓裏男性的頭頂部和腳底部各發現了一面銅鏡，在胸部則發現有兩件「琵琶形」青銅短劍。

兩面銅鏡的造形、紋樣及大小極為相似，只是在重量上有些微的差別，直徑都是二十點四公分，重量一個是零點五公分，另一個是零點六公分。銅鏡的形式是圓的，鏡面比較突出。不同的是鏡面的外緣，繚繞有兩圈的凸紋帶，內圈是一種回紋

，外圈則是變形回紋和三角形斜線紋交互圍繞着。另外在背面是以些微凹陷斜向邊緣，三個半環形鈕就像掛着三個腳排成三角形。再加上紋樣是與「南山根類型」銅鏡有不同之處（圖五）。

上述在鏡面外緣施紋的情形雖很少見，但在同樣文化類型——西元前七至六世紀遼東半島旅大市後牧樓上第三號積石石槨墓出土的單鈕銅鏡（圓形、直徑二十七公分，重量零點二公分）是相同的【註一六】（圖六）。

②二號石槨墓出土的銅鏡

在二號石槨墓內也發現了兩面幾何紋多鈕銅鏡分別被放置在人骨頭頂部和腳部，而在人骨左右兩側發現兩件「琵琶形」青銅短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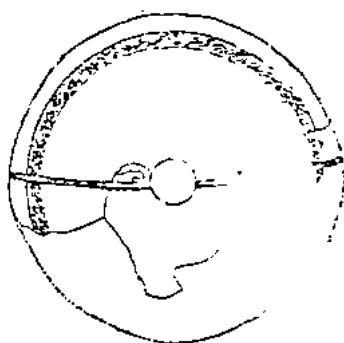
就兩面鏡出土的位置、形式或紋樣（即在鏡面周圍施兩圈幾何紋帶的形式）是和一號石槨墓出土的銅鏡相同的；不同的只是鏡身較薄，靠近鏡背邊緣地方有四個半環形鈕排成方形，並在鈕的穿孔上很明顯地留有套繩索的痕跡，直徑大小各是七十公分、七十點一公分，重零點二、零點三公分。

③三號石槨墓出土的銅鏡

根據報導「這三座墓葬的形式和出土的陪葬品，基本上是相同的。【註一七】」。因此，在第三號石槨墓裏也發現了一面銅鏡和一把柄端裝飾有石製枕狀物的「琵琶形」青銅短劍。因為是由不同的兩人採集的，因此出土的位置不詳。



圖五 十二臺營子 M₁ 出土多鈕銅鏡（1/4）



圖六 遼東半島旅大市後牧樓上第3號石槨墓出土單鈕銅鏡（見『考古』，1960，3，p. 16）

這面銅鏡比先前所看到的四面銅鏡較大較重。背面則有連續的「乙」字形幾何紋，幾何紋之間的地紋則全部填滿短線紋。靠近背面邊緣處有三個大鈕，很整齊地排成「川」字形。鏡的外緣和鈕上的幾何紋樣式則與一、二號石槨墓出土的多鈕銅鏡大體相似，鏡的大小直徑是二十二點五公分，重零點八公分，鈕的長度是三點三公分，寬一點三公分，高零點五公分（圖七）。

④十二臺營子出土之幾何紋多鈕銅鏡的特徵和年代

十二臺營子右槨墓出土的幾何紋多鈕銅鏡和南山根石槨墓出土的素紋單鈕銅鏡不同。在鏡面也鑄有紋飾，在背面有「畫心」裝飾，鈕上有幾何紋裝飾。特別是鈕，增為三個或四個，裝飾成三角形、四角形成「川」字形。

在所看到的「乙」字紋即是普通所說的「鋸齒形（sawtooth）」模樣，也稱為「雷紋」或「鈞連雷紋」。這是殷商早期青銅器上常可看到的樣式。而且這種連續以「乙」字紋為主紋，以短線紋為地紋的手法，也是典型的殷周時代的樣式。

殷周時代的銅鏡一般是單鈕的，從單鈕增為雙鈕的情形也已在西周末東周初的虢國銅鏡中看到。十二臺營子出土銅鏡的鈕增為三或四個，排成三角形、四角形甚或「川」字形，與其說是有着特殊的意義，還不如說或許是要為了加強裝飾的效果。

這正如所謂銅鏡基本上只需鏡面光滑可照即可，然而從十二臺營子墓中所出土的銅鏡，從邊緣到鏡面都鑄有幾何紋的裝飾，這是前所未有的變化。由此可證，以上的推測也是很合道理的。

不過十二臺營子墓出土的銅鏡由於過分強調裝飾，幾乎破壞了銅鏡的基本功能，其後在渤海沿岸，朝鮮半島仍然流行着十二臺營子墓相同的幾何紋飾，但對於紋飾鏡照面、鏡背邊緣和三或四個鈕，這種過度強調裝飾的做法未流行，鏡面仍是光



圖七 十二臺營子 M3 出土幾何紋多鈕銅鏡

滑可用的，只是在鏡背「畫心」處有幾何紋飾，鏡鈕也依舊鑄成雙鈕並列的樣子。

據說在韓國忠清南道出土物中也有「乙」字型幾何雙鈕銅鏡一面【註一八】（直徑十一點三、重零點七公分），其紋樣與十二臺營子第三號石槨墓出土的幾何紋多鈕銅鏡幾乎完全相同（圖八）。

此外，關於十二臺營子墓的年代，據報告者推測應在春秋末期或戰國時代【註一九】。由於這個年代的考古出土最少，所以衆說紛紜，一再修訂，例如烏恩說是在春秋初期或稍晚【註二〇】；林傑則主張是春秋中期【註二一】，徐秉琨也推測是在春秋中期【註二二】，但是靳楓毅則認為十二臺營子的上限年代是西周末至春秋初期，但下限則絕不超出春秋中期【註二三】。因此，金良善先生修定十二臺營子遺址的年代應在紀元前八至七世紀左右【註二四】。

Ⅱ 鄭家窪子之五一二號墓出土的銅鏡

一九六五年在遼寧省瀋陽市鄭家窪子的大型豎穴式土壙墓（M六五一二）中出土了一面幾何紋多鈕銅鏡（雙鈕紋鏡），六面大小不同的素紋銅鏡和三件「琵琶形」青銅短劍【註二五】，這些都是被韓國學界所重視的重要遺物【註二六】。

① 幾何紋雙鈕銅鏡

在鄭家窪子M六五一二號墓中，男性人頭骨的上方放着一個劍櫃，劍櫃裏有兩把「琵琶形」青銅短劍，及一面幾何紋雙鈕銅鏡。這是一面圓形鏡，鏡身較重，鑄造技術粗糙，鏡面光滑，鏡背邊緣並排着兩個半環形鈕，「畫心」施有幾何紋，和幾乎是以平行連續的「乙」字形幾何紋雙鈕，上下用兩條線施紋。在「乙」字紋之間的地紋是短斜紋，其紋樣與十二臺營子第三號石槨墓出土的幾何紋多鈕銅鏡類似。透過鈕上留有使用的繩索痕跡推測是日常生活用具。直徑是八點八公分，雖然是屬



圖八 韓國忠清南道出土幾何紋雙鈕銅鏡
（見『朝鮮古文化綜鑑』第一卷，
1947）

於較小型的，但重有一公分，鈕的長度是一點四公分（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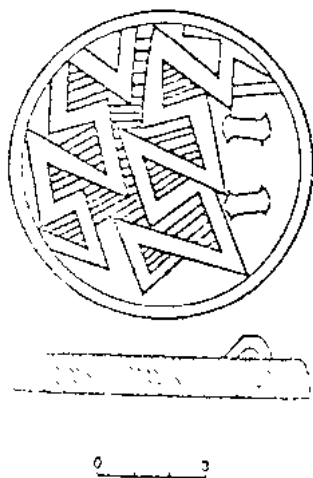
② 素紋單鈕銅鏡

除了上述幾何紋雙鈕銅鏡外，在六五一二號墓人骨的頭部和足部發現了兩面稱為大型「鏡形飾」的銅鏡，鏡面各自向外立着，兩面大型「鏡形飾」之間，排列着四面稱為小型「鏡形飾」的銅鏡。這兩面大型「鏡形飾」和四面小型「鏡形飾」只有大小的差別，大的長二十八公分，小的長十五公分，其形式和一般的銅鏡完全一樣，所謂的大小「鏡形飾」鏡面突出，無任何修飾，鏡背素面無紋，中央部位掛着一個長方形的橋狀鈕。這些鏡面上都有織物的痕跡。

③ 鄭家窪子出土銅鏡的特徵和年代

到目前為止，在渤海沿岸地區和朝鮮半島所發現的幾何紋多鈕銅鏡和「琵琶形」青銅短劍，大都是從石槨墓或石棺墓及積石墓之類的石墓系的墓制中出土的。比較起來鄭家窪子六五一二號墓的情形就非常特殊了，因為這種墓是一種穴式土壙墓，金元龍教授認為這是中國式墓制的流入（註一七）。墓制雖有不同，但出土的青銅器遺物均具有「南山根類型」的特徵。特別是「琵琶形」青銅短劍，和南山根一〇一號石槨墓出土的短劍及朝鮮半島出土的短劍基本上是同一系統的，只是劍刃比南山根短劍來得突起和彎曲，顯得稍微鈍些，而且在造型上有較細長的感覺。

若細究銅鏡的特徵，鏡面的水平和十二臺營子墓出土的凸面銅鏡有所不同，鄭家窪子的銅鏡較為光滑，鏡背僅在「畫心」處有以粗糙手法所施的「乙」字形幾何紋。鏡鈕也減為雙鈕，但又和西周末東周初的虢國墓地出土的動物紋雙鈕銅鏡的鈕並列在鏡背中央有所不同，它是並列在邊緣的，這種佈置的方法也是韓國雙鈕銅鏡的重要類型。特別是與一九二二年傳說在平壤市附近出土的「乙」字形幾何紋雙鈕銅鏡（直徑九點四公分、重零點三公分）（圖十）相類似。有關鄭家窪子遺址的年代，據報導，由於西漢的甕棺墓被破壞，六五一二號墓無疑的應是西漢前的古墓，加以墓中出土的「琵琶形」青銅短劍共同類



圖九 鄭家窪子M6512出土
幾何紋雙鈕銅鏡



圖十 韓國平壤地方出土幾何紋雙鈕銅鏡（『朝鮮古文化綜合鑑』第一卷，1947）

形的短劍及明刀錢曾在遼東半島後牧城驛樓上遺址出土，因此可將六五—二號的年代定於紀元前六至五世紀（註八）。但是筆者認為儘管當時的收集者從後牧城驛樓上遺址所收集的明刀錢不是和短劍同屬地層（三號石棺墓），係由於整理者在整理時，混入鄰近地區的東西因而造成的錯誤。同時筆者也已證實應將其歸入為春秋初期至春秋中期（註九）。另外，從鄭家窪子六五—二號墓出土的銅鏡年代也應再細考。筆者個人的推測，應在春秋中期紀元前七至六世紀（註十）。

（三）渤海沿岸東部地區的銅鏡

1. 樺甸堅穴式岩石墓出土的幾何紋雙鈕銅鏡

一九七九年在高句麗的舊疆——松花江支流輝發河流域的吉林省樺甸縣橫道河子西荒山屯的東山、荒山、大平屯等三個地點，即被稱為堅穴式岩石墓的八座墓，其中第二號石墓（M2）裏發現了兩面幾何紋雙鈕銅鏡和兩把青銅短劍用的劍柄，在第三號石墓（M3）也發現一面銅鏡及與前者相同形式的劍柄一把（註三）。

① 第二號石墓出土的銅鏡

A、標本M2—7幾何紋雙鈕銅鏡

銅鏡的形式是圓的，鏡面光滑，在鏡背中心傾向邊緣有兩個一字形鈕並列着。在背面的邊緣有一道凸線外緣和內緣、外緣和內緣之間和「畫心」有類似三角紋交錯的幾何紋，中央部位雖有些微破損，但大體上還可以猜得出其紋飾來（圖十一）。直徑是十公分，厚零點三公分，雖沒有出土說明，但若看圖面的單面，可看出整個鏡面有些微凹陷的現象。

B、標本M2—8號雙鈕銅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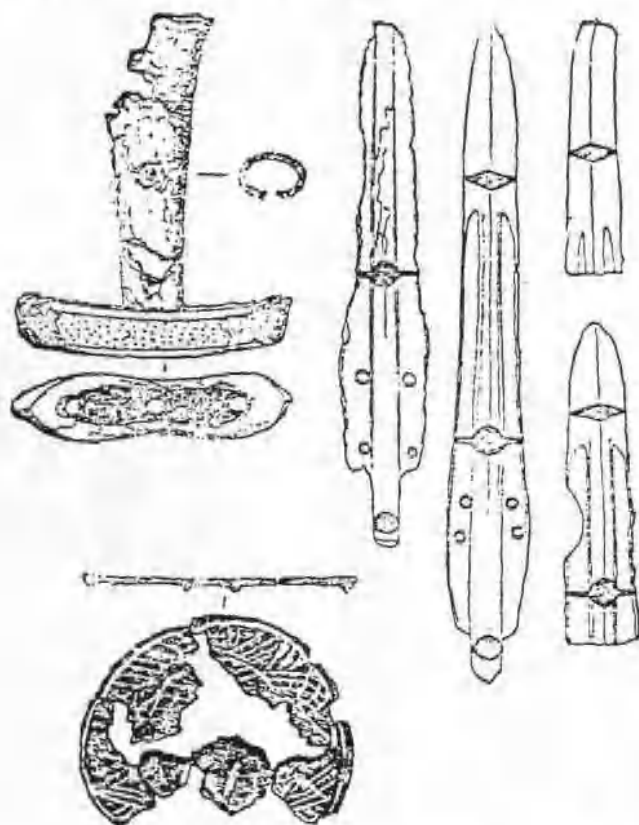
銅鏡的形式也是圓形的，鏡面光滑，鏡背處有平行鑄成的一字形鈕，邊緣處有凸形的周緣狀，「竇心」有沒有紋飾不詳，但大概是和二一七號銅鏡相同的。直徑十一公分，比前者大一公分，重零點三公分，此點兩者相同。

根據「出土器物統計表」中的記載，在第三號石墓中也發現一面銅鏡和一把劍柄，但卻沒有詳細的說明。

② 樺甸出土的幾何紋雙鈕銅鏡的特徵和年代

要探討樺甸出土物的年代，首先要說西荒山屯的八座墓制。這是掘穿山頂的自然岩石，所製造的墓室和墓道，在頂部蓋有數片石板。這可以說是「一種石槨墓制」，與今年嶺南大學在慶北郡慶山邑所挖到的「押督國」豎穴式岩石墓的形成相類似，這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九八三年五月實地採訪）。

再者在這八座西荒山屯石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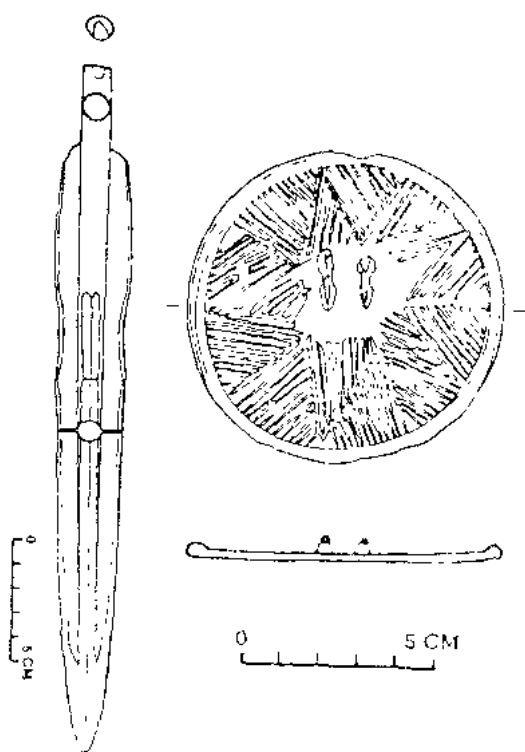
圖十一 樺甸豎穴式岩石墓出土幾何紋雙鈕銅鏡（上）、銅劍（下左）丁字形劍柄（下右）

發現到五把青銅短劍的劍柄、四把劍身，一把劍把頭飾、兩把「觸角式柄」和一個把頭。特別是青銅短劍，在形式上比前述的十二豪營子或鄭家窪出土的「琵琶形」青銅短劍的樣式為遲。但比起忠南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與幾何紋雙鈕銅鏡（圖十二）一起出土的細形銅鏡是較早期【註三三】。

另外從幾何紋雙鈕銅鏡（M2—7）的幾何紋中，看到的斜線，是以三角紋形成的對稱形式，這使人聯想到殷代的葉脈紋或是「齊家期」的七角星幾何紋（圖十三）。鏡背的鈕不像十二豪營子的三個或四個，而是鑄成雙鈕，像虢國銅鏡或是鄭家窪子出土的銅鏡。尤其像銜接二等邊三角形的樣子，在三角形裏施平行斜線紋，稱為斜線三角紋形式。從忠南牙山郡新昌面南城里石棺墓出土的兩面幾何紋雙鈕銅鏡【註三三】，或是從忠南大田市槐亭洞石槨墓【註三四】裏與細形銅劍一起出土的幾何紋雙鈕銅鏡（二號鏡）及從蘇聯沿海山「邁黑」口流域的「理賓衛斯托夫」石槨墓【註三五】與細形銅劍一起出土的幾何紋雙鈕銅鏡，基本上是一致的（圖十四）。

此外，分析西荒山屯屯出土的銅鏡元素成分，銅（Cu） 0.111% ，鉛（Pb） 96.4% ，鐵（Fe） 0.11% ，銀（Ag） 0.171% ，銻（Sb） 0.48% ，錫（Sn）則無。其中含鉛量最多，其特徵是含鉛低，硬度大，容易鑄造和磨光【註三六】。由於是以鉛為主要成分，幾乎可稱為「鉛鏡」。

至於西荒山棺石墓的年代，據報告者說，上限定戰國末期，下限是漢初【註三七】，但是從西荒山屯第六號石墓（七六H×M六）的底部所出現的C₁₄年代測定，是紀元前四七〇至四〇〇年【註三八】。因此這些銅鏡可能是在紀元前五世紀時



圖十二 韓國忠清南道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出土銅鏡及銅劍